扬州设局查办戏剧违碍与清代禁戏的制度化*

丁淑梅

【摘要】 乾隆一朝是戏曲高度繁荣的时代，而官方的制度性禁戏也全面展开。扬州设局查办戏剧违碍，作为乾隆禁书扩大化和清代禁戏制度化的一个双重扭结点，昭示了帝王谕旨禁戏的权力话语覆盖地方政权和布控基层社会的过程。讨论扬州查缴戏曲在清代禁戏制度化中的许多不为人知的细节，可以进一步考察清代后期戏曲创作主体精神的隐遁，以及昆弋大戏向花部乱弹递嬗、以文本创作为中心向以表演伎艺为中心的戏曲形态裂变。

【关键词】 扬州设局 戏剧违碍 删改曲本 清代禁戏 制度化

【中图分类号】 I207.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4-0890(2013)03-058-10

清代戏曲的总体走向，呈现着一种雅部让为花部、大戏衍为小戏、由文本创作中心向舞台演艺中心发展的过程。而这种聚合裂变的转向，主要在戏曲勃兴鸣盛而禁戏亦随之靡繁的乾隆一朝。高宗曾于乾隆十六年（1751）至四十九年（1784）六次南巡，在所到都邑、必经扬州，掀起一次次嗜戏贡演热潮的同时，对于那些在他看来有碍满清王朝统治、“海盗诲淫”的戏曲开始有所警惕。始于乾隆三十九年（1774）整编《四库全书》、寓禁于征地查缴违碍书籍以清肃民间反清思想的禁书运动中，戏曲剧本很快成为最高统治者征稽查禁的对象。而扬州设局查办戏剧违碍，正是乾隆禁书扩大化和清代禁戏制度化的一个双重扭结点。考察扬州设局查办戏剧违碍的前前后后，有助于我们仔细分析帝王谕旨禁戏权力的具体运作细节、查缴方式以及清廷禁戏制度化的酝酿过程，从而了解和把握特定社会环境和文化政策的变化对于戏曲生存样态和发展走向造成的实际影响。

一、清前期的官方禁戏与地方风俗整顿

清初以来，基于民族避讳和王权意识，清廷颁布了不少谕旨律例、台规条法，并发动地方势力与社会舆论，对通俗文学作品加以禁制，禁戏则主要是从创作和搬演两个层面展开的。顺治九年（1652）“提准，坊间书贾，止许刊行理学政治有益文业诸书，其它琐语淫词，及一切滥刻窗艺社稿，通行严禁。违者从重究治。”^①这是清代第一次禁止刊布琐语淫词。但“琐语淫词”、“滥刻窗艺社稿”语焉不详，对违反者也未定以处罚。康熙二十六年（1687）刑科给事中刘楷奏禁淫词小说一百五十余种，康熙诏准“淫词小说，人所乐观，实能败坏风俗，蛊惑人心”，为严诛邪教、屏息异端而严加毁版治罪^②。此后“淫词小说”禁令在康熙四十年、五十三年，雍正二年，乾隆三年、五年等年间一再重申。禁戏法则虽不断细化，雍正二年以后的禁令还添设了对违禁造作、刊刻市

【作者简介】 丁淑梅（1965-），女，陕西西安人，文学博士，四川大学中国俗文化研究所教授。（四川成都，610064）

*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中国古代禁毁戏剧编年史》（项目编号：09BZW040）；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清代戏曲禁毁与管理研究》（项目编号：10JJDZONGHE012）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① 素尔纳等：《钦定学政全书》卷七《书坊禁例》，《续修四库全书》史部第828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版，第584页。

② 《清实录·圣祖实录》卷一二九，第五册，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385页。

赁的定罪及缴书毁版、闭铺禁售的制裁^①，但“琐语淫词”对戏曲剧作的指涉尚不具体，清初至雍正末对戏曲剧作的禁毁目的不甚明确，许多禁令形同一纸空文，实施力度非常有限。比之于戏曲创作的接受阈，社会影响更为直接的戏曲演剧活动引起了统治者关注。从琐语淫词、淫词小说到淫书传奇，“淫词”的关键性指涉也更多地与戏曲小说在底层的特定传播渠道和伴生环境关联密切：与民间结社与宗教祭祀共生的、未经官方承认的、反正统的集会活动。从雍正三年（1725）定例禁演剧装扮帝王先贤的“褻嫚神像罪”^②始，官方从法律制度上加强了对民间演剧的思想管制，一些为政一方的地方官也颁行了民间演剧禁令。如顺治末年任陕西潼关按察副使、康熙中期任江苏巡抚的汤斌数颁禁神会演戏令^③；康熙二十四年（1685）浙江巡抚赵士麟厘风俗《禁优戏》^④；康熙二十九年（1690）上蔡知县杨廷望发布驱逐清戏、啰腔的禁戏详文^⑤；雍正初年田文镜在河南发布文告禁赛戏^⑥。这些禁令虽视民间演剧与嫖赌盗匪同类、加以“诲淫长奢”、“僭逆惑乱”的指罪，但总体看来，乾隆以前，依托于赛祭活动和节俗娱乐的民间演剧较为活跃，清廷的集权力量还未能管控戏曲演剧向民间纵深发展的地带，而分散的地方权力对演剧风俗伦纪的清肃亦不均衡，没有形成强力辐射、集中有效的禁网。

随着赛戏和民间演剧的日炽，这种基于集权强化和风俗整顿的禁戏行动，至乾隆一朝变得频繁起来。乾隆元年至三年，先后有十数通奏折得到旨批，从江南到云贵、从京畿到福建、从闽浙到云南，从云南到安徽，针对地方演剧的风俗整顿迅即铺展开来。从这些奏折及旨覆的禁戏指向看，有两点变化值得注意。首先，对赛戏酬神、礼俗演剧的禁毁，乾隆初年出现了缓急优容之论。乾隆元年（1736）四月十八日，江南总督赵弘恩

奏禁演戏折，以雍正帝对魏廷珍杖责违禁演戏保长事的旨覆说明自己对江南民众蠲免谢恩聚众演戏有所优容的原因^⑦。四月二十一日此奏抄送安徽，安庆巡抚赵国麟接到“禁止非时台戏不致有妨农务折内朱批上谕一道”，奏明江北之凤颖府亦有祈年报赛，演戏酬神，原属吹豳饮蜡之遗风，人情难免之常事，至蠲免谢恩偶一演戏，亦不在禁限，而一旦演戏妨农，则必禁无疑^⑧，四月二十五日旨批“好”发回。至五月，江西巡抚俞兆岳奏禁演扮淫戏以厚风俗，上谕：“先王因人情而制礼，未有拂人情以发令者。忠孝节义，固足以兴发人之善心，而嫖褻之词，亦足以动人心之孤愤，此郑、卫之风，夫子所以存而不删也。若能不行抑勒，而令人皆喜忠孝节义之戏，而不观淫秽之出，此亦移风易俗之一端也。汝试姑行之。”^⑨此曰“淫秽之出”，指流行于江西一带、泛及江南的装扮妖冶、土腔方音的采茶戏。同年，云贵总督尹继善上崇礼教以端风化事折，提请整顿婚丧祭礼，强调“不许聚饮演戏、扮演杂剧”，六月初五日旨覆慎重对待、“徐徐经理”^⑩，因“省与省异，亦且郡与郡殊，恐因循日久，礼教失传”，其中纠缠着民族风俗习惯和政策平衡问题，乾隆也深知风俗问题非一日之计，中原辽阔，地域差异大，齐之以礼，难绳之以法；且一旦奉朱子《家礼》为通则，满洲旧俗会受到冲击。江南、安徽、江西、云贵的四次禁戏，均标榜圣人治世宽严相济之理，似对祈神赛社、蠲免谢恩之类的演剧活动有所松动和宽纵，对所谓郑声“淫戏”还存而不论，这可以看出乾隆立朝之初收拢人心的政治治术。自乾隆五年（1740）《大清律例》再颁禁搬帝王杂剧、当街夜戏后，以曾任鄂陕巡抚的陈宏谋为始，又掀起了示禁赛戏的攻势。与乾隆七年后江西、陕西、河南、河北等地严禁丧戏、夜戏、

① 延龄等：《台规》卷二五《五城》，光绪十八年（1892）刊本，第5页。

② 《大清律例按语》卷二六《刑律杂犯》，道光二十七年（1847）海山仙馆刊本。

③ 汤斌：《汤斌集》（上），范志亭等辑校，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03年版，第83、339页。

④ 赵士麟：《读书堂全集·彩衣集》卷四四《抚浙条约》，《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240册，济南：齐鲁书社1997年版，第320页。

⑤ 《（河南）上蔡县志》卷一《地輿志》，康熙二十九年（1690）刊本。

⑥ 田文镜：《抚豫宣化录》卷三，张民服校点，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5年版，第105页。

⑦ 哈恩忠编选《乾隆初年整饬民风民俗史料》（上），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历史档案》2001年第1期，第29页。

⑧ 《乾隆初年整饬民风民俗史料》（上），第30页。

⑨ 《清实录·高宗实录》第九册卷十九，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485页。

⑩ 《乾隆初年整饬民风民俗史料》（上），第31页。

赛戏的攻势相照，这种于风俗之治操之以缓、“深谋远虑”的做法，可见乾隆初年在对待民间演剧一事上所做的迂回和酝酿。其次，禁戏主要集中在对乐户流民的职业禁限上。古代的女乐女戏、游民卖艺，历来是风化问题的焦点。本年七月初四日，提督江南总兵为整顿吏治军政而奏禁乐户女戏^①。此奏山西大同乐户流为娼妓，以雍正除乐籍事再申杜绝妓源。其实，大同自永乐后乐户渐多，民间散乐户的流动献艺活动一直受到官府逐禁，即名系梨园以歌舞娱人，尚不能摆脱海淫败俗罪名，而况其中一部分无衣食之源的乐户沦为卖艺兼卖身之人，更被视为娼匪祸乱世道。乾隆二年（1737）闽浙总督稽曾筠因会稽人胡楚珩悬匾争斗事遵旨查明堕民本末上奏折^②。堕民系南宋罪民，而男子习优唱、逐鬼为业，女子群走市巷、卖艺卖身，其中一部分为民间流散乐户，而浙东绍兴府及沿海各郡县称堕民。此奏以堕民不耕不织，无业恒产，“倚赖行业糊口资生”，是习为污贱、自堕匪民之列。正如雍正年间除乐籍并未给乐户与民同例、改业自新之路，此奏虽设想种种改业办法，亦于二月十五日得旨奉行，但清廷除乐籍从未落实，民间流散乐户的生存和从业也从来没有得到合法承认。与此同年闰九月十五日，安庆巡抚赵国麟为风阳民俗游惰，立法禁诫游民四处花鼓秧歌^③，九月二十二日，工科给事中阎紘玺为端风化奏禁京畿侑酒歌郎^④；乾隆三年（1738）掌京畿道事、云南道监察御史卢秉纯为请禁京师小唱淫侈风气事奏折^⑤，福建水师提督王郡奏禁下南戏童蓄发折^⑥，都将游民乞食卖艺、“艳曲淫词当筵献媚”、幼童蓄发装旦女戏，视为荡人心志、靡费僭逆之罪，以此整顿民风、整治流民乱秩。

清廷谕旨禁戏覆盖各级行政机构和基层社会有一个逐步推衍的过程，不断有来自江南、云贵、

闽浙、安庆、福建的总督、提督，巡抚、监察御史，还有工科、礼科的给事中，广东、河南各地的知县等参与进来。如禁刊卖淫词艳曲及良家子弟演戏令是礼部复台臣魏象枢上疏^⑦的。查堕民折由太子太傅、文华殿大学士兼吏部尚书、总理浙江海塘、管理总督事务兼管盐政的稽曾筠递呈。严禁京畿弹手歌郎奏折是工科给事中阎紘玺请奏的^⑧。而奏禁下南戏童蓄发之弊的是福建水师提督王郡，后转交闽浙总督郝玉麟、福建巡抚卢焯追查。帝王谕旨禁戏的权利布控，则有一个自中央六部逐步渗透地方基层的过程。就中央机构而言，吏部、刑部在禁戏行动中频繁搬演着颁诏示谕、下令用刑的角色。而如礼、兵、工、户四部这些看似与禁戏无甚瓜葛的部门亦多提督参办。这种现象可以看出乾隆前期官方集权力量整合地方政权和基层社会机构查禁民间演剧形成的连动机制。而从风俗人心整顿、控制流民等外围空间管制戏曲活动，收效不大且很难落到实处，这决定了乾隆后期禁戏着力点的转向。

二、乾隆后期禁戏着力点的转向与查办戏剧违碍

乾隆十八年（1753）谕旨禁译《水浒传》、《西厢记》，将“教诱犯法”、致满洲习俗之偷的秽恶书毁版^⑨，是为清廷明确禁毁戏曲剧目之始。乾隆三十九年（1774）征编《四库全书》，八月上谕：“明季末造野史者甚多，其间毁誉任意，传闻异词，必有诋触本朝之语。正当及此一番查办，尽行销毁，杜遏邪言，以正人心而厚风俗”^⑩。在查缴违碍书籍以肃清民间反清思想的过程中，戏曲剧本的禁毁成为乾隆禁戏之一大端，这是清廷禁戏的一大转向，也是戏曲史上集中禁毁戏曲剧作的开始。自乾隆三十九年至四十三年，因编纂

① 哈恩忠编选《乾隆初年整饬民风民俗史料》（上），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历史档案》2001年第1期，第31页。

② 《乾隆初年整饬民风民俗史料》（上），第36页。

③ 《乾隆初年整饬民风民俗史料》（上），第39页。

④ 《乾隆初年整饬民风民俗史料》（上），第34页。

⑤ 《乾隆初年整饬民风民俗史料》（上），第42页。

⑥ 《乾隆初年整饬民风民俗史料》（上），第43页。

⑦ 《（河北）宣化县志》，康熙五十年（1711）刻本。

⑧ 《乾隆初年整饬民风民俗史料》（上），第34页。

⑨ 《清实录·高宗实录》卷四四三，第一四册，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773页。

⑩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纂修四库全书档案》，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240页。

《四库全书》而“寓禁于征”的禁书运动扩大化，文字狱、诗祸及戏曲文祸牵涉出一批戏曲剧作。这其中包括了官方禁戏一贯声称的“淫词艳曲”如《桃笑记》、《十种传奇》之类的神怪风情剧；《五色石》、《四声猿》等文人抒怀写愤剧，以及《喜逢春》、《鸳鸯缘》、《广爱书》、《二十一史弹词》等时事剧与历史题材民间说唱作品。

风情剧一贯被禁，与禁书运动看似瓜葛不多。乾隆四十年（1755）八月初三日《奉准两江总督咨查书目》报入《四库全书处咨查书目》、《抽毁全毁咨查书目》中列有《桃笑记》^①，后在《禁书总目》之《军机处奏准全毁书目》、《应缴违碍书籍各种书目》^②中均列出。因各家禁书目所载不同，有《桃笑集》、《桃笑记》、《桃笑迹》之名，“查《桃笑迹》系明官抚辰撰，所记皆其为令时案牍之文，中有悖犯字句，应请销毁”^③，《桃笑记》当为戏曲作品。据《〈古典戏曲存目汇考〉补正之一》引乡绣春容《古杭红梅记》，疑本剧叙唐安郡刺史王瑞之子王鹗于红梅阁题诗戏令梅花开放，夜半仙女笑桃题诗自荐，成两情之好，后与鹗家人释嫌、助夫夺魁事^④。正是笑桃追觅爱情的胆力、面对凶险的大义、出类拔萃的才情慧心，被指为神怪艳情混杂、荒诞不经而遭禁。

文人怀才不遇、愤世嫉俗、与时事逆流的违碍剧作被禁毁，《五色石传奇》是这类牵连诗祸的剧作典型。《五色石传奇》载于乾隆四十三年（1778）江宁布政使所刊违碍书籍目录中，十二月初八日两江总督《奉准外省咨查书目》列出“《五色石传奇》，徐述夔”^⑤，后《军机处奏准抽毁书目》^⑥、《清代禁毁书目四种索引·应毁书目》^⑦均列出。徐述夔生活于康熙乾隆间，因乾隆三年（1738）科举制艺有“礼者，君所以自尽也”一句，礼部以大不敬罚停会试，隐居小镇直至去世。乾隆四十三年（1778），同乡人蔡加树与徐述夔后人争夺田产，举告其子孙为之刊刻的遗诗集

《一柱楼诗》有“明朝期振翻，一举去清都”、“江北久无干净地，乾坤何处可为家”等语诋毁本朝，乾隆直接干预，酿成大狱^⑧。而徐乡试同年沈德潜为徐文集做传，称其“品行文章皆可法”，又将为帝王润笔文字据为遗诗珍藏，列贰臣钱谦益诗文于别裁诗中，如此“视悖逆为正常，并为之揄扬，实属昧良负恩”之种种因由，决定了这场文字狱的扩大，沈德潜所有爵衔谥典尽行革去，徐述夔与其子被开棺戮尸，其孙与两名校对学生被斩首，三级官员不少牵连落难。《五色石传奇》牵连诗祸被禁，已不见于世，可见这起源于经济纠纷、坐实反清意识、罪加大逆不道、牵及帝师丧德的文字狱背后，清廷文化专制的残酷性。

自乾隆三十九年以后的五年间，戏曲剧作遭禁毁的原因虽各不相同，但在查禁野史传闻、明末实录诋毁清廷、反映清兵南下史实的禁书背景下，戏曲禁毁的焦点集中在了反映明季时事政治、忠奸斗争、“犯上作乱”、借古讽今的历史剧，以及揭露政治腐败、反抗民族压迫、反映社会矛盾、富有强烈现实意义的作品上。《喜逢春传奇》、《鸳鸯缘传奇》、《广爱书传奇》的禁毁，即是在查禁明遗民著作和明季野史背景下展开的。《喜逢春传奇》被禁，是乾隆四十年（1775）闰十月至十二月间发生的高纲为《徧行堂集》作序案牵连出的。《徧行堂集》是明遗民金堡的著作，金堡曾助桂王抗清，明亡后号澹归削发隐居。乾隆四十年（1775）军机处十八通档案中，有三通与澹归和尚《徧行堂集》案相关的奏折涉及《喜逢春传奇》，即《将高秉交部议处陈建及清笑生两家子孙均可不必深究谕军机处档》、《海成奏遵谕查办徧行堂集皇明实纪喜逢春传奇折缴回朱批档》、《萨载奏喜逢春传奇板片销毁折军机处档》^⑨。因各地查缴明代野史，在搜查曾出资刊刻并为《徧行堂集》作序的原韶州知府高纲之子高秉家时，偶然查到江宁清笑生撰《喜逢春》传奇一本，被认为“亦

① 华东师大图书馆古籍部藏《咨查书目》六卷，愚史 1952 年版。

② 姚觀元：《清代禁毁书目四种》，北京：商务印书馆民国二十六年（1937）版，第 46、150 页。

③ 姚觀元：《清代禁毁书目四种补遗》，北京：商务印书馆 1957 年版，第 191 页。

④ 赵兴勤：《〈古典戏曲存目汇考〉补正之一》，《艺术百家》2001 年第 3 期，第 60 页。

⑤ 华东师大图书馆古籍部馆藏《咨查书目》六卷，愚史 1952 年版。

⑥ 姚觀元：《清代禁毁书目四种》，第 92 页。

⑦ 抱经堂编《清代禁毁书目四种索引》卷一，民国二十一年（1932）抱经堂铅印本。

⑧ 谢苍霖、万芳珍：《三千年文祸》，南昌：江西高校出版社 2002 年版，第 505 页。

⑨ 原北平故宫博物院文献馆《清代文字狱档》（上），上海：上海书店 1986 年版，第 215、258、260 页。

有不法字句”，随即在江宁两处展开清剿。经萨载、高晋调查“向未见有此书”，并开始调查清笑生里籍后人等情况。江西巡抚海成奏折更称“清笑生所撰喜逢春传奇未据查获，但此等书内既有应毁之籍，是曲本小说一项亦不可忽，正恐应毁者不止于此……”^①。据此可知，《喜逢春》传奇查而未获，很可能成为乾隆借文字狱查缴曲本的导火索，因为萨载奏折还申明“《喜逢春传奇》系同《春灯谜》等十种合刻，其板现在杭州尊贤堂书坊……查起去后今准咨覆《喜逢春传奇》板片已经仁钱二县查起解局，现由浙省奏缴销毁……”，可知此案涉及戏曲作品不止于此，还有《喜逢春》列第一的《十种传奇》，包括《春灯谜》、《鸳鸯棒》、《望湖亭》、《荷花荡》、《花筵赚》、《长命缕》、《金印合纵记》、《凤求凰》，及杂剧《四大痴》^②。在对散居河南、苏州等地高纲家族历时三月的藏书大清缴中，金堡《偏行堂杂剧》数种，亦列于禁毁总目、违碍书目，“尽遭禁毁，全罹浩劫”^③；而与金堡著作一起查缴的还有《双串记》、《绿牡丹》、《珍珠囊》等亦属戏曲作品。此后数年间，《喜逢春传奇》一再被查禁，有十数通奏折和呈报的违碍书籍清单均列入禁书目^④。《喜逢春》传奇成于崇祯二年（1629），《古本戏曲丛刊》二集收录，作者清笑生生平不详。剧叙魏忠贤与贪官崔呈秀、宫中乳母客氏勾结弄权、独霸东厂，矫旨将弹劾其罪行的官员毛士龙、杨涟、周大中等削职，还准备将左都御史高攀龙等清流文人批审致死以清门户。高攀龙倾家资救毛士龙脱难，后投池而死。东厂爪牙为魏忠贤立生祠二十三处。新天子登基，封赠忠良，毛士龙奉诏除奸，魏忠贤自缢。作为明末时事剧，《喜逢春》客观反映了明末奸佞弄权、清兵肆恶的史事。其第十七出《封爵》有满洲努尔哈赤带兵犯宁远、锦州，先后被明统帅袁崇焕击败，努尔哈赤气急

败坏，背上发疽而死等情节，可知此剧在高纲案中 被牵连禁毁并非偶然。

乾隆四十一年（1775）四月二十日，《暂管江苏巡抚萨载奏续缴违碍书籍板片折》特别强调“凡有应毁书籍，不拘诗文、杂著以及传奇小说，悉令尽数查缴，详解销毁，以期净尽”，后附禁书清单中有“《鸳鸯缘传奇》一部，两本。明宜兴海来道人著”^⑤，同时列出的还有《喜逢春传奇》四部。档案后编者附注曰：“以上《天启实录》……《鸳鸯缘传奇》，书名前均有乾隆朱点”。可见《鸳鸯缘传奇》与那些明代野史一起被重点加以销毁。《鸳鸯缘传奇》成于崇祯八年（1635），今存崇祯刻本，收入《古本戏曲丛刊》二集。乾隆四十一年（1776）六月江苏巡抚杨魁第四次奏缴禁书目中列有《鸳鸯缘传奇》，但失名^⑥。海来道人，即路迪，字惠期，江苏宜兴人，生卒事迹待考，其戏剧作品仅存此剧一种。《鸳鸯缘传奇》以杨直方与张淑儿的爱情故事为线索，以爱情写动乱，披露了明末政治腐败、番王恶僧肆虐、边廷攘扰的世相，剧中多涉清兵入关事，有“虏酋”、“虏骑”、“虏蠢”、“洗膻”等“违碍”字句，其卷首“缘始”曰：“文官爱财、武官爱命，空自百年养士，虏骑纵横，满朝震恐，天下无一义士”，“据卷首有崇祯八年序，则此时清兵正侵扰辽东，亦作者感慨时事发之”^⑦，其明确的现实指征概是遭禁的动因。而同年十月四日江苏巡抚杨魁奏缴伪妄书籍，与各种明末实录和违碍文集罗列一起的，还有三吴居士《魏党广爱书传奇》（即《广爱书传奇》）^⑧。《清代禁毁书目四种》之《应缴违碍书籍各种名目》列入^⑨。《清代禁书总述》云：“此书叙明代反阉宦魏忠贤之事实，暴露了魏忠贤与客氏之罪恶。其中部分篇幅有反清意识。乾隆年间，被列入应缴违碍书籍各种名目中”^⑩。正如《鸳鸯

① 原北平故宫博物院文献馆《清代文字狱档》（上），第260页。

② 王彬：《清代禁书总述》，北京：中国书店1999年版，第382页。

③ 傅惜华：《清代杂剧全目》，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9页。

④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纂修四库全书档案》，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463、466、506、514、599、619、676、692、840、1022、1039、1071、1213页。

⑤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纂修四库全书档案》，第510页。

⑥ 雷梦辰：《清代各省禁书汇考》，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89年版，第155页。

⑦ 庄一拂：《古典戏曲存目汇考》，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第1036-1037页。

⑧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纂修四库全书档案》，第538页。

⑨ 姚觐元《清代禁毁书目四种》，商务印书馆民国二十六年（1937）版，第139页。

⑩ 王彬：《清代禁书总述》，第182页。

缘传奇》剧末《鸣晦又题》曰：“《喜逢春》与《广爱书》，同被亡秦付烬余。独爱惠期词隽爽，玉纤插架壮吾庐。”^①《喜逢春》、《广爱书》、《鸳鸯缘》同列禁毁书目，《广爱书》被祁彪佳列为“逸品”，称其“不尽组织朝政，惟以空中点缀。谑浪处甚于怒骂，传崔、魏者，善摭实，无过《清凉扇》；善用虚，无过《广爱书》”^②。《广爱书》原剧已佚，其与《清凉扇》二剧均演魏忠贤、崔呈秀、客氏相互勾结，把持朝政，残害忠良事。由此可见明末关注现实、反映重大政治斗争的时事剧遭到厉禁的情况。

乾隆朝查缴禁毁书籍时，中央特设有分工详备的三处机构：即红本处，专门清理收藏在内阁中的原有图书；办理纂修《四库全书》处，负责由各省采进的遗书；军机处，专门办理各省督抚奏缴呈进的违碍书籍^③。从以上奏折看，此“三处”的后两个机构都参与了督理禁毁戏曲剧本的事务和活动；而各地负责查办戏剧违碍具体事务的，多是朝廷特派钦差、地方要员，禁戏的指令和行动可以说遍及地方官僚机构的各个环节和各种职事。乾隆三十九年至四十三年查缴的这批戏曲剧作，与文字狱诗祸相关的禁书一同呈缴，虽牵带而出数量有限，三五年间不过一二十种，但追查的主要焦点是有本可循、更多注入了文人易代反思情怀、对清廷不敬的昆腔传奇大戏揭露时弊、干预政治、隐射史事的反清动向。这些剧作因尖锐的时事指征遭到厉禁，不仅使清初以来的历史与时事剧创作受到无形的精神威慑和思想禁锢，也埋下了大规模删改曲本的伏笔。

三、扬州设局删改曲本与禁戏制度化

清代禁戏的参与人士、涉及机构及处理方式不断变化。利用士绅舆论和民间经济力量，由官方设立专门机构，大规模查缴戏曲剧本与禁毁演剧活动，是清代发明的、也是官方认为最有效的方式；而扬州设局删改曲本并进而查禁花部演剧，即是这种发明之始。乾隆四十五年（1780）十一

月十一日谕军机大臣：“前令各省将违碍字句书籍，实力查缴，解京销毁。现据各督抚等，陆续解到者甚多。因思演戏曲本内，亦未必无违碍之处，如明季国初之事，有关涉本朝字句，自当一体飭查。至南宋与金朝关涉词曲，外间剧本，往往有扮演过当，以致失实者；流传久远，无识之徒，或至转以剧本为真，殊有关系，亦当一体飭查。此等剧本，大约聚于苏扬等处，著传谕伊龄阿、全德留心查察，有应删改及抽掣者，务为斟酌妥办”^④。从此次设局查禁戏曲的过程和御批奏折看，有三点值得讨论：

其一，设局查办戏剧违碍的时限和参与人员。谕令明确征缴、删改、抽掣反映南宋后金、明季国初事件“失实”的戏曲剧本，但真实动机则是禁绝戏曲表现清人起事入关前后的一些不光彩行为甚至罪行。谕旨先是传谕两淮盐运使伊龄阿、苏州织造全德“留心查察”、“斟酌妥办”，接着又嘱“须不动声色，不可稍涉张皇”，担心全德“未能妥协，所有苏州一带应查禁者，并著伊龄阿帮同办理”。身为两淮盐运使的伊龄阿对此诚惶诚恐，深感责任重大。因为扬州作为当时全国的戏曲活动中心之一，查缴曲本首当其冲。至于苏州，更是戏剧创作演出的重镇。扬州如何开展查缴？苏州如何帮同办理？这让伊龄阿颇费斟酌，“奴才伏查外间扮演戏文，洵为太平景象，而词曲中违碍字句及扮演过当流传失实者，不一而足，诚如圣谕，不可不厘剔删除，以彰教孝教忠之至意”，考虑到自南宋、元明至今六百年戏曲刻本藏本繁多，且查缴曲本涉及许多戏曲相关问题，非“专业人士”或许不能措手。在仔细揣摩旨意后，伊龄阿做出了在扬州设立删改戏曲词馆的决定，并于本月二十日上奏：“奴才钦遵谕旨，当即飭委运司仓圣裔、同知张辅、率领总商江广达设立公局，将各书坊宋元明旧剧本详细确查，并将教习人等平日收藏新旧戏文，无论刻本抄本，概令呈缴……遵行现已札商苏州织造全德一体查办”^⑤。据伊龄阿此奏，扬州设立公局删改曲本的时间在谕

① 蔡毅：《中国古典戏曲序跋汇编》，济南：齐鲁书社1989年版，第1382页。

② 祁彪佳：《远山堂曲品》，黄裳校录，上海：上海出版公司1955年版，第17页。

③ 雷梦辰：《〈清代各省禁书汇考〉序》，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89年版，第1页。

④ 《清实录·高宗实录》卷一一一八第二二册，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939页。

⑤ 《乾隆四十五年十一月二十二日朱批档》，朱家潘、丁汝芹：《清代内廷演剧始末考》，北京：中国书店2007年版，第57页。

旨下后不久，即乾隆四十五年十一月十一日至十九日之间。参与此事、帮同设局的还有当地皇亲族裔、淮北分司汉阳同知张辅、以广达为行盐牌号的两淮总商江鹤亭，可见伊令阿深感此事迫急、数日之内迅速协同各方酌办之情形。苏州织造全德接到协商函，即于二十二日应奏：“凡有明季国初之事，有关涉本朝字句，并南宋与金朝关涉词曲及扮演过当，应删应改及应行抽掣者，俱一一粘签，陆续恭呈御览……但奴才粗识字义，汉文不能通晓，恐有遗漏，所有苏州查出各戏本，奴才校勘之后，将有无违碍之处，签名密封，送交伊令阿再行斟酌妥办”^①。乾隆四十六年（1781）春，图明阿接替伊龄阿任两淮巡盐御史，并主持扬州删改戏曲词馆事。据《扬州画舫录》，伊龄阿是奉旨设局，时在乾隆丁酉，即四十二年（1777），图明阿为继任，历时四年事竣。同书稍后录黄文暘《曲海序》，言乾隆辛丑，即四十六年（1781）奉旨修改古今词曲^②。这些说法先后出入，在设局动机和时间上引起一些猜解。从乾隆四十六年五月二十九日旨覆“今图明阿竟于两淮设局，将各种流传曲本尽行删改进呈，未免稍涉张皇，且此等剧本，但须抄写呈览，何必又如此装潢致滋靡费，原本著发还，并著传谕图明阿、全德，令其遵照前旨，务须去其已甚，不动声色，妥协办理，不得过当，致滋烦扰”^③之语看来，如果不存在乾隆有意指责臣下而掩饰谕旨设局企图的话，那么扬州设局删改曲本一事也许并非出自上谕，而是伊龄阿、图明阿揣摩谕旨而“办理过当”的行为，其始当在乾隆四十五年十一月中旬，删改戏曲词馆的工作也并未持续四年，据乾隆四十六年六月初一日图明阿奏折“窃自思省，诚为过当……今钦奉谕旨，各种流传曲本不必一例查办，将来应行删改抽掣之剧已属无多，更不应仍存此局，迹涉张皇。现已即日撤去”^④的说法，前后只有半年多时间。乾隆四十六年（1781）二月初一日，“凌廷堪应伊龄阿之聘，客扬州，参与删改古今杂剧、传奇之违碍者……黄文暘、李经任总校，凌廷堪、程枚、陈治、荆汝为任分校；委员会有：淮北分司汉阳张辅、经历查建佩、扬州朱篔、罗

聘、李斗……等八十八人”^⑤。此次禁戏行动由官方出资设立专门机构，参与筹建、征调人员有特办钦差、地方大员、当地望族巨商以及各地制曲名家，波及以扬州为中心的全国许多地区。被征调的曲家和文人名流有黄文暘、凌廷堪、李斗、金兆燕；还有来自江苏扬州府、淮安府、江宁府、常州府、苏州府、通州等四十七人，浙江湖州府、杭州府、绍兴府、宁波府等十八人、安徽徽州府、泗州府、宁国府等十七人；而且还有辽宁、天津、湖北、贵州、江西等地曲家也被延聘而来，具体参与戏曲检阅查勘、删改抽掣工作。而设局查办戏剧违碍也并非伊令阿一人，除主事参与的图明阿、苏州织造全德外，还有直隶总督袁守侗也曾征缴书籍入省城书局详加勘察，山西巡抚喀宁阿还专设公局飭委专员查勘。

其二，查缴曲本与四库征书、查缴违碍书籍的关系。乾隆四十五年十二月十一日，直隶总督袁守侗接到本月初七日大学士公阿桂、尚书额駉公福隆安寄来十一月二十八日据伊令阿复奏“著将伊令阿原折抄寄各督抚阅看，一体留心查察”的上谕，“当即钦遵转札……凡有弋阳等腔演戏曲本留心查出，即申送省城书局详加勘酌，倘有流传失实、字句违碍者，即分别删改抽掣，随时恭呈御览”。十二月十三日，山西巡抚喀宁阿遵旨“当即缴飭两司在于省城设立公局，通行各府州县，一体飭查，将所有宋元明新旧戏文无论刻本抄本，概令呈缴，臣飭委专员细加检阅，其中如有明季国初之事，关涉本朝字句及南宋与金朝关涉词曲或竟用本朝服色者，详悉查明……并将扮演过当之处通行示谕，严密查禁”。十二月十六日，江苏巡抚闵鹗元遵旨“将剧本并弹词鼓儿词内谬妄违碍之处分别芟除飭禁”；乾隆四十六年正月初六日湖广总督舒常、湖北巡抚郑大进遵旨“派员搜访违碍书籍，遇有应禁之剧本，自当一体收解，或可以删改抽掣之处，分别粘签恭呈御览。惟有石牌腔、秦腔、弋阳腔、楚腔等项，虽声调各别，皆极为鄙俚……其内如有淫词邪说，本不应听其任情捏造，蛊惑人心，若事属不经稍有违

① 《乾隆四十五年十一月二十二日朱批档》，第59页。

② 李斗：《扬州画舫录》卷五，北京：中华书局1960年版，第107页。

③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纂修四库全书档案》，第1357页。

④ 《乾隆四十五年十一月二十二日朱批档》，第66页。

⑤ 中国戏曲志编辑部：《中国戏曲志·江苏卷》，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1992年版，第740页。

碍，尤宜留心禁止。”^①二月十二日，两广总督觉罗巴延三接旨及抄伊令阿原折，遵旨“照江苏办理之例，分别查办”，二月二十一日广东巡抚李湖遵旨“照江南办理成规，传谕书肆及伶人，各将现有刻抄本子呈缴委员校阅核明……即将查禁曲目、服色并令梨园各班于开载正杂戏出内，遵照删改，仍飭令外府州属，画一妥办俱报。唯是粤东……市廛流传戏剧往往装点荒唐，扮狭邪为香艳，演戏匪为英雄……一并分别禁止搬演”，二月二十八日，湖南巡抚刘墉遵旨“与藩司陈用敷等向各地方官告知，令将戏班剧本陆续查验，应禁者分别善掣……再旧时传奇曲本及小说野史等未经优人演唱者，恐复不少，仍归搜访违碍书籍案内查缴，分别销毁”^②。四月初六日江西巡抚郝硕遵旨缴到《全家福》等花部声腔剧本^③。五月二十日，闽浙总督陈辉祖奏“飭属安详妥办，如剧本中查有字句违碍并扮演过当者，俱令分别查销禁止。再江浙地方连界，而江南繁富集镇，梨园演习剧本较多，授贩传播，在所恒有。如有应禁之本，臣一并移查，彼此关会，随时办理。”^④从这些奏折的内容看，图明阿、全德、郝硕查缴曲本都以查缴违碍书籍为首务和理据。直隶总督袁守侗折、广东巡抚李湖折主要是遵旨查办空格书籍原由和情形的，山西巡抚喀宁阿折、湖广总督舒常折、湖南巡抚刘墉折均是汇缴违碍书籍并解缴王仲儒《西斋集》案板片的，闽浙总督陈辉祖则上《奏缴违碍书籍并请展限一年及查察剧本情形折》，加之乾隆四十六年二月十六日军机大臣报奏《四库全书体例》、《四库总目提要》交审情形^⑤看，曲本查缴大多和征剔四库书的行动、查缴牵连文字狱、诗祸的违碍书籍一起遵旨呈报、并案而特出。可见扬州设局是乾隆直接授意查缴禁书的文化清剿的一个组成部分，查缴曲本自始至终都在乾隆监控和谕旨干预下进行。“不动声色、妥协办理”的训诫是实，设局张皇、“办理过当”的

责备是虚。设立庞大机构，耗费人力，最后却查得禁本无多，是乾隆斥去设局方式的隐因。而查缴不力的纠责、审时以待稳准狠“杀机”的谕旨有失，进而引发了苏扬之外，波及江南所有州府，乃至直隶、山西、湖南、湖北，广东、贵州、江西等地查缴曲本及查禁戏曲演剧行动在更大范围和地域展开。

其三，查缴曲本数目与地域声腔流播的关系。作为此次查缴曲本的主事者，两淮盐运使继任者图明阿于乾隆四十六年三月二日、四月九日及六月一日三次回奏，苏州织造全德六月初一日奏折，均呈报了查缴曲本的详细情况。吴县沈起凤曾受督理苏州织造全德之聘，听阅剧曲七百余种，查察勘审，分批报送扬州删改戏曲词馆^⑥。从这些奏折报审文字看，此次查缴数量巨大、版本板片名目繁杂、流传地域广泛，且查办戏剧违碍非仅查缴曲本，继而扩大到查禁花部声腔演剧流播活动。乾隆四十六年（1781）三月二日图明阿奏遵旨查办戏剧违碍字句专折云：“本年正月内，伊令阿将删改抽掣之《精忠传》等五种具奏呈进……将局内所收官商及戏班教习等缴到戏曲逐一查检……现在所存戏曲计二百八十四种……至全德节次送来共一百二十种，已据分别粘签，抽掣改正”^⑦。四月初六日，江西巡抚郝硕奏：“据附省之南昌府禀称，遵经传谕各戏班，将戏本内事，涉明季及关系南宋、金朝故事，扮演失当者严行禁除外，所有缴到各戏本，派员查核，内有全家福、乾坤鞘二种，语有违碍，又红门寺一种，扮演本朝服色，应呈请查办……查江右所有高腔等班，其词曲悉皆方言俗语，鄙俚无文，大半乡愚随口演唱，任意更改，非比昆腔传奇，出自文人之手，割剗成本……遐迩流传，是以曲本无几，其缴到者亦系破烂不全钞本，现在检出之三种内，红门寺系用本朝服色，乾坤鞘系宋、金故事，应行禁止；全家福所称封号，语涉荒诞……俱应尽行销毁。

① 《乾隆四十五年十一月二十二日朱批档》，第55-61页。

② 《乾隆四十五年十一月二十二日朱批档》，第61-63页。

③ 故宫博物院文献馆《史料旬刊》第二十二期《查办戏剧违碍字句案》，民国十九-二十年（1930-1931）刊，第793页。

④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纂修四库全书档案》，第11351页。

⑤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纂修四库全书档案》，第1243、1245、1250、1291、1295页。

⑥ 中国戏曲志编辑部：《中国戏曲志·江苏卷》，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1992年版，第44页。

⑦ 《乾隆四十五年十一月二十二日朱批档》，第63页。

臣谨将原本粘签，恭呈御览。”^①四月初九日，图明阿再奏专折云：“今办得《金雀记》等九种，并全德移来《鸣凤记》一种，奴才俱覆加酌核，缮写清本，同原本粘签，恭呈御览。奴才又覆勘得《千金记》等十种，又全德移来《种玉记》等十种，均系曲白内间有冗杂之处，抽改无多，现在即以粘签原本进呈……其余在局曲本，仍敬谨遵奉，细心勘办，随时呈缴。并会同全德再行慎密搜罗，不敢稍有滋扰懈怠。”^②六月一日，全德据乾隆五月二十九日上谕“据图明阿奏查办剧本一折，办理又未免过当。剧本内如《草地》、《拜金》等出，不过描写南宋之恢复及金朝败退情形，竟至扮演过当，称谓不伦，想当日并无此情理，是以谕令该盐政等留心查察，将似此者，一体删改抽掣”旨意，奏覆“伏查苏州陆续收买过曲本四百三十四种及勘出三百十五种，移交两淮盐政复核，节经奏明在案。兹又勘出应禁止销毁者四种，删改抽掣者三十二种，无碍可存者八十三种，共一百九十种，照前分别粘签，节次封交图明阿复核汇呈……合已买曲本四百三十四种通行勘竣，移交缘由及现在办理情形，敬谨缮折恭奏”^③。

谕旨禁戏旨令频下，大量戏剧曲本呈缴扬州并“解京呈览”。扬州设局查办戏剧违碍，其中有数量和名目可循的，图明阿第一次奏缴《精忠传》等284种，第二次奏缴《金雀记》、《千金记》、《鸣凤记》、《种玉记》等31种，全德第一次奏缴120种，第二次收买434种，奏缴《草地》、《拜金》等119种，应禁者4种，删掣者32种，无碍者83种。江西巡抚郝硕奏缴《全家福》、《乾坤鞞》、《红门寺》等3种^④。扬州删改戏曲词馆秉承乾隆旨意，将苏州织造及各地督抚、巡抚等进呈的剧本详加审改，共删编校勘了1194种曲目^⑤。凡以明末清初史事涉满清字样违碍的、宋金时事剧扮演失实的、装扮满清服色及情节的，均在删禁之列。从报检的版本板片上看，所有戏曲刻本、抄本、戏班藏本、教习本、优人演唱可考剧本、宋元戏文旧本、古今杂剧、传奇曲本、新编戏本

全在查禁之列，流播地域泛及直隶、山西、湖南、湖北、两广、江苏、江西、辽宁、天津、闽浙、四川、云南、贵州等地。在查缴的十种曲本确目中，无名氏演岳飞故事的《精忠传》、无心子叙潘岳事的《金雀记》、沈采写韩信故事的《千金记》、许自昌传霍去病故事的《种玉记》、托名弇州门客、演严嵩父子专权伏诛故事的《鸣凤记》五部作品为昆腔传奇大戏，这些剧作或多或少都牵涉忠奸斗争、易代更迭，特别是《精忠传》涉及宋金交战、《鸣凤记》敷演明季时事，在清廷看来都是有诋毁之嫌的谬妄悖逆之作。朱佐朝借宋朝乌廷庆故事、以包公断案揭露官闹恶乱、影射时事、“语有违碍”的《乾坤鞞》应为杂剧作品。“所称封号，语涉荒诞”、“扮演本朝服色，系宋、金故事，应行禁止”^⑥的《全家福》、《红门寺》为高腔剧本。《全家福》剧本已亡佚、内容无考，《红门寺》据京剧和车王府曲本，叙于成龙微服私访至红门寺审钟、擒拿借烧香礼佛之机调戏奸占民女的淫僧法炳的故事。《草地》、《拜金》，是出自《如是观》的折子戏。《如是观》又名《倒精忠》、《翻精忠》，此剧以“精忠直叙岳飞之死，而秦桧受冥诛，未快人意，乃作此以翻案，言飞成大功，桧受显戮，两人一善一恶，当作如是观”^⑦，《拜金》实南宋恢复、金朝退败之《败金》的避讳。

伊龄阿奏折有“再查昆腔之外，有石牌腔、秦腔、弋阳腔、楚腔等项，江、广、闽、浙、四川、云、贵等省，皆所盛行，请敕各督抚查办”的覆奏；江西巡抚郝硕又言“查江西昆腔甚少，民间演唱，有高腔、梆子腔、乱弹等项名目，恐该地或有流传剧本，飭令该县留心查察”。可见此次查办字句违碍，不仅关注戏曲剧本的文字内容与情节“违碍”问题，演剧活动中的服饰道具等具体装扮细节，昆腔以外广为传唱、“时来时去”、流动性大、传播迅速的花部唱腔如乱弹、高腔、石牌腔、秦腔、弋阳腔、楚腔、粤戏等新兴的乱弹俗腔和弹词、鼓词等民间说唱伎艺，也成为查禁的一项重要内容。因为从乾隆二十八年（1764）

① 故宫博物院文献馆《史料旬刊》第二十二期《查办戏剧违碍字句案》，第793页。

② 故宫博物院文献馆《史料旬刊》第二十二期《查办戏剧违碍字句案》，第794页。

③ 《乾隆四十五年十一月二十二日朱批档》，第65页。

④ 故宫博物院文献馆《史料旬刊》第二十二期《查办戏剧违碍字句案》，第793页。

⑤ 李斗《扬州画舫录》，北京：中华书局1960年版，第120-121页。

⑥ 故宫博物院文献馆《史料旬刊》第二十二期《查办戏剧违碍字句案》，第793页。

⑦ 傅惜华：《明代传奇全目》，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版，第334页。

戏曲选集《缀白裘》开始刊行，到乾隆三十五年（1770）《缀白裘》总集问世，标志着昆腔全本传奇大戏演出式微和折子戏的兴起。在昆腔大戏和杂剧创作外，依托地方声腔生存的民间地方戏，在明末清初弋阳、青阳等血缘相近的南曲声腔融淬下，形成了长江流域以高腔为主、中原一带以弦索腔为主的“乱弹”竞放、花部繁兴的局面；至康熙年间，出现了各种高腔、昆腔、弦索腔、梆子腔系的花部地方戏演播交流的蓬勃势头。花部折子戏以其生动的内容，细致的表演，充满浓郁地域风情的唱腔风格，赢得了乾隆中期以后的戏曲舞台。花部诸多俗腔被禁，说明乾隆后期禁戏的两个转向：一则查缴曲本从昆腔传奇向地方折子戏转移；二则花部戏存本零散、幕表戏、提纲戏、戏班藏本简陋难以追查具体的文字违碍问题，而民间演剧活动中存在着在官方看来更为严重的“违碍悖逆”问题，进而引发了乾隆以后查禁花部声腔演剧活动的禁戏转向。

扬州设局查缴的确名曲本无多，只有区区十种，这些剧本所反映的问题和文字违碍似乎也远不及此前查缴的《喜逢春》、《鸳鸯缘》、《广爱书》等一批时事剧那样突出；而查办戏剧违碍本在征剔四库书的大背景下展开，因诗祸、文字狱牵连的历史著作和诗文作品成为查缴的重中之重，所以设局查缴曲本行动仅持续了半年多时间，因谕旨查缴曲本的反清动向实效难显而草草收场。但如此大规模删禁戏曲剧本，一千多种剧本被斧劈刀砍、筛罗网禁，许多极具思想价值的剧本很可能因此四散亡佚。此次删改曲本的影响还远不止此，清代官方设局禁书禁戏、查缴通俗文艺作品的方式自扬州设局始沿袭下来，并不断发明，敦促舆论发动地方善士、民间力量募集资金，给偿定价收书销毁，成为清廷禁毁戏曲小说及民间说唱文艺的一大方略和定制。其中道光十八年（1838）苏郡设局收毁淫书，道光二十四年

（1844）浙江设局禁毁淫词小说，同治七年丁日昌设局查缴禁书禁戏^①，都是规模很大、波及很广的行动，且都牵扯到不少戏曲作品。

清廷查禁违碍书籍是禁锢思想的重要举措，体现了王朝思想、种族意识和皇权观念合而为一的政治统制。乾隆一朝由整修《四库全书》而查缴禁书，由历史著作而诗文、由诗文而小说，愈演愈烈的文字狱、诗祸大背景，造成了戏曲剧本在劫难逃的被禁毁命运。从清初以来官方的风俗整顿与禁戏着力点变化，到乾隆中期以后禁书运动扩大化而矛头指向时事剧，从扬州设局查缴删改曲本，到各地奉谕查办戏剧违碍，清廷禁戏权力话语的运作与制裁，使戏曲创作与搬演活动受到不小冲击。戏曲遭到厄运，那些一贯被官方视为蛊惑人心、伤风败俗、有碍统治的“淫词曲本”首当其冲，而乾隆查缴曲本的焦点其实在反映明季史实的历史及时事题材作品，由于涉及易代政事及民族避讳等内容，是自标“治天下以人心风俗为本”的清帝极为敏感和憎恶的。扬州设局查办戏剧违碍作为清廷禁戏的扭结点，不仅显示出乾隆一朝禁书运动的扩大化，也体现出清廷裁汰异己、清理异端、驯服民众、强化专制的强制性文化政策推行的过程。乾隆一朝是戏曲高度繁荣的时代，而官方的制度性禁戏也全面展开。从某种程度上说，在禁书运动的文化清剿下，帝王谕旨禁戏的权力话语覆盖地方政权和布控基层社会的过程，即是清廷制度化禁戏行动和举措展开的过程。清廷禁戏的制度化造成了戏曲创作主体精神的隐遁，影响了清代后期昆弋大戏向花部乱弹递嬗、以文本创作为中心向以表演伎艺为中心的戏曲形态裂变。

[责任编辑] 黎国韬

^① 余治：《得一录》卷十一之一，同治己巳年（1869）刻本，第5页；王利器：《元明清三代禁毁小说戏曲史料》，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第119页；丁日昌：《抚吴公牍·札飭禁毁淫词小说》卷一，光绪三年（1877）林氏铅印本，第6页。

Main Abstracts

Red Line: The Definitiveness of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Safeguarding Concept

Xiaokang Gao 1

Legal Protection of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here in after ICH) needs the definitiveness of safeguarding restriction, namely “red line”, however there is conflict between living safeguarding of ICH and restriction. The protection object is continuous and indefinible, thus the definitiveness of protection is to find restriction range in the changing process. In cultural ecological protection, definitiveness is found by the concept of ecological niche; and in productive protecti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ultural inheritance value and commercial one is the basis for the definitiveness; in ICH education, as a way of protecti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education content and cultural inheritance should be noted, avoiding turning traditional cultural education into regular skill training which will gradually deviate from the cultural inheritance purpose of ICH education.

Policies, Concepts and Regulations of Safeguarding Cultural Heritage in Germany

Berthold Riese, Xiaobing Wang 15

Being a Federal Republic, in Germany, culture is not a major concern on the national but on the subordinate level of the Bundeslaender. Any adoption of international laws and regulations is therefore performed with a considerable retardation because various legal bodies have to coordinate their efforts. Decentralization of cultural politics is indeed the most marked difference of Germany and other countries. However, Germany has a well established administrative and judicial system for safeguarding cultural heritage and possesses a deeply rooted consideration for transmitting and integrating traditional culture in social life. After prolonged political discussion, in December 2012, the German parliament “Bundestag” finally ratified UNESCO’s Convention for Safeguarding the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Yangzhou’s Establishing Agency of Investigating and Dealing with Drama and the Institutionalization of Qing Dynasty’s Ban of Drama

Shumei Ding 58

Chinese drama highly prospered in Qianlong dynasty, meanwhile the institutional ban of drama by government was in full swing. As a dual knot of Qianlong government’s magnifying the scope of banning book and the institutional ban of drama, setting up an agency in Yangzhou to investigate drama breach of taboo shows the process which emperor’s power of commanding the ban of drama covered local authorities and control over grass – roots society. To discuss the unknown details of investigating and capturing drama in Yangzhou could further explore the reclusion of drama composition subject spirit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 and the transformation from Kunyidaxi (昆弋大戏) to Huabuluan (花部乱弹), from the text – centered creation to the performance – centered one